

原道

# 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

■ 徐瑜璐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深刻论述了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鲜明提出“不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规律性认识”“以科学的态度、体系化的方式推进自我革命”的时代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锲而不舍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从理论和实践上生动演绎了自我革命的全新境界和精神品格,系统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重大问题。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已然成为党的自我革命的鲜明思想理念导航。

## 注重“第一个答案”与“第二个答案”相辅相成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以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我们党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持久探索实践,深刻总结封建王朝盛极而衰、农民起义先胜后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历史教训,深入剖析古今中外治乱兴衰留下的历史命题,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在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即“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基础上,教育引导

中国共产党能够历经千锤百炼仍朝气蓬勃,战胜一个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关键在于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锲而不舍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从理论和实践上生动演绎了自我革命的全新境界和精神品格,系统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重大问题。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已然成为党的自我革命的鲜明思想理念导航。

全党勇于刀刀向内、刮骨疗伤、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提出了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严密组织体系、严明纪律规矩,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坚持高压反腐,誓将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一百多年来,“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们党既依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执着,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新时代新征程,时刻秉持“第一个答案”与“第二个答案”统筹推进的清醒和坚定,相得益彰,互为驱动,不断注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的动力,以党内监督催生其他监督,健全党内监督体系,发挥巡视监督利剑作用和派驻监督探头作用,实现党内监督全覆盖;同时,积极畅通人民群众建言献策和批评监督渠道,充分发挥群众监

督、舆论监督作用,形成发现问题、及时纠偏的有效机制,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

## 注重严管与厚爱辩证统一

注重严管与厚爱辩证统一,持之以恒“锻造坚强组织、建设过硬队伍”。成功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本质,是避免执政的政治集团、政党组织在掌握政权之后因精神懈怠、意志衰退、能力不足而导致自身机体衰败、丧失民意民心支持进而出现政权更迭、治乱循环的周期性现象和历史怪圈。这里“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必须高度重视“以锻造坚强组织、建设过硬队伍为重要着力点”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大要求。组织和队伍问题,始终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命门和要害。一方面,坚持以严的标准要

求干部、以严的措施管理干部、以严的纪律约束干部,使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明确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是党员、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以高压态势为“基座”,在用好第一种形态上下功夫,强化日常管理监督,发现问题及时谈话函询、提醒纠正,让党员、干部真切感受到严管就是厚爱、治病为了救人,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新时代新征程,要坚持维护党的纪律严肃性和信任爱护干部相统一,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最大限度防止干部出问题。同时,深入推进“三个区分开来”的落地生根,将干部在改革创新中出于公心、主观无意的失误错误予以包容,消除干部后顾之忧,激发干部敢于担当作为的勇气和魄力,为深入践行“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提供坚实的组织保

证和强劲动能。

## 注重执纪与执法贯通发力

注重执纪与执法贯通发力,深入突显“正风肃纪反腐”重要抓手。“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推进纪委监委合署办公,履行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两项职能,党纪处分条例专门设置“对违法犯罪党员的纪律处分”一章,实现了党纪和国法的有效衔接,促进纪律与法律双施双守。实践中,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统筹运用党性教育、政策感召、纪法威慑,深化运用“四种形态”,贯通党纪与国法、衔接纪法罪,把执纪审查和依法调

查、党纪处分和政务处分、党内问责和监察问责等统一起来,对违纪违法的党员干部,既按照党章党纪给予纪律处分,又依据监察法、政务处分法等给予政务处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截至2022年4月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筹用好党纪国法“两把尺子”,推进纪法贯通,共立案审查调查438.8万件、470.9万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64.4万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执纪执法贯通,有效衔接司法,推进反腐败工作法治化、规范化,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四种形态”贯通党纪与国法,连接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着眼标本兼治,在严惩极少数严重违法违纪分子的同时,不断加强对于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由此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治国必先治党,强党方能强国。“我们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主动”。中国共产党能够历经千锤百炼仍朝气蓬勃,战胜一个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关键在于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不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规律性认识,把党的自我革命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严密,把每个领域、每条战线、每一环节的自我革命抓具体、抓深入,在新的赶考之路上继续创造令人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思享

# 从四重逻辑看城市治理的五种模式

■ 薛泽林

城市的产生与发展伴随着人类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政治逻辑、市场逻辑、社会逻辑此消彼长形塑了不同时期的城市治理模式。围绕“让生活更美好”这一城市目标,中国特色的城市治理模式探索一直没有止步,并逐步确立了“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价值取向。从全球城市发展的历史维度考察城市治理的演进历程,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义,并树立新时代城市治理“人民逻辑”的新叙事。

## 第一代城市治理 官僚城市模式

工业革命以前,城市往往作为统治或交易的中心存在,并在中西方呈现出较大差异,但统治多于治理是其共同特征。在我国,古代的城市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被“君王行政”的逻辑和需要支配,并一直贯穿于整个农业时代。具体表现包括,礼制作为首要的价值原则,遵循政治优先的基本逻辑,城市管理实施国家法与民间法并存,实行城市统领乡村的“城乡合一”方式等。在欧洲,从古希腊罗马奴隶时代起,国家与城市融为一体的城邦政治孕育出了以“自治”为特征的独特城市管理模式,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更是推进了“民主自治”在城市管理中的发展,如设有独立的城市自治管理机构,颁布城市管理自治法律法规,实施城市公民制度等,但无一例外都是为官僚和贵族服务。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城市将政治逻辑放在首位,城市管理主要为统治官僚服务,既不注重城市的经济效应,也不重视城市的社会效应。

## 第二代城市治理 分包城市模式

工业革命兴起以后,随着大机器生产逐步向城市集聚,新兴资产阶级以财富为后盾的话语权日趋重要,城市开始突破政治和统治的需要,逐步由官僚城市向生产城市转变。尤其是在大机器生产在煤矿、铁矿区周边集聚并形成或重塑城市的过程中,市场逻辑逐步取代了政府逻辑,城市人口急速膨胀、城市环境日益恶劣,旧有以统治为目标的城市管理模式逐步失效,城市公共卫生和治安问题已经到了威胁统治稳定和企业生产的地步,更加专业的城市管理不得不被提上日程。此时,由于专业的城市管理市场机构和社会组织尚未成立,传统城市管理模式通常以政府为活动的唯一主体,在科学管理思维的指引下,权力控制、行政命令、制度约束成了主要手段,政府通常采取分包制的原则,将城市管理中的基础设施管理、环卫等工作分包到各个部门,由各部门进行再次分包。在城市管理方面,由于各个部门权限和职能有限,且部门与部门之间缺乏交流,政府部门、行业、企业间存在信息和业务割裂,城市工作呈现出了缺乏顶层统筹规划的弊病。在城市服务方面,侧重于行政命令和制



新华社图

度约束的执行方式,使得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低、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城市管理成本高但效果差,社会资源未能被高效利用。难以形成整体协同效应,普通市民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是这一时期城市管理的主要特征。

## 第三代城市治理 物业城市模式

在分包城市的模式下,城市管理各部分的割裂和专业壁垒导致城市管理经常出现合成谬误问题。特别是同一片区中,不同的公共产品管理主体不一、行动方式各异,由此导致城市管理“九龙治水”的问题产生。因此,将管理升级为治理,探索相对整体性的城市治理模式成为新的诉求,用社会逻辑取代政府和市场逻辑成了新趋势。“物业城市”是将空间维度和整体治理的理论引入城市治理,通过进一步强化社会逻辑,以整体性物业管理为主要手段的城市治理模式。其把城市看作一个“大物业”,将物业管理的系统性思维和流程管理能力融入城市治理,从而为城市提供相对整体性的管理服务。在这一模式下,城市空间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每个区域都由专门的物业公司或机构进行管理和维护,并通过市政委员会等机构协调不同片区之间的发展和平衡。为了提升管理的专业性,城市还会在各个片区引入社会专业团队,交由社会力量进行服务运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城市公共空间与公共资源、公共项目全流程“管理+服务+运营”的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以此满足市民对于专业化管理和整体性服务的需求。物业城市通

过将专业化和协同化整合起来,在构建新型多元协同治理体系的过程中,打造“政企协同”的城市治理创新模式,以此实现城市的高效运行和管理。

## 第四代城市治理 资管城市模式

城市作为人类的聚集地,当政府逻辑逐渐淡去之后,市场逻辑和社会逻辑又引申出新的问题。依照社会逻辑,城市应该更多地关注民生福利,将城市资源更多地用在社会分配之中,而不是像市场逻辑那样,更多地将资源用在再生产或资本积累之中。但作为事物的两极,单纯的市场逻辑会导致公众不满,并进而影响城市的稳定和长远发展;单纯的社会逻辑也会导致投资不足,使得城市缺乏竞争力,并有可能威胁城市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新的资管城市模式越来越重视政府逻辑、市场逻辑和社会逻辑的平衡,并将城市经营理念念用到城市工作之中,通过推动物业城市与资管服务的深度融合,不但极大地拓展了物业城市的管理幅度和深度,同时还还将城市管理咨询、产业招商运营、城市资产运营等高附加值服务融入日常的运营管理中。通过经营城市让城市资产持续增值,核心功能持续强化,既为城市精细化治理赋能,也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支持,成为资管城市的主要目标。近年来,国内外不少城市确立了建设“景区城市”“公园城市”的目标,其核心思路即是用文旅、消费的理念规划城市,将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以旅游业发展带动相关产业繁荣,延长产业链条,促进城市经济多元

化发展与持续性增长。但在这一过程中,城市治理的主体往往“忽明忽暗”,使得城市工作目标产生偏差。

## 第五代城市治理 人民城市模式

面对新科技革命的冲击和世界格局的深刻变革,城市在未来发展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不论是政府逻辑、市场逻辑还是社会逻辑都无法适应新的竞争需要,需要以有为政府统筹协调城市各类资源,打造行动合力;以有效市场激发企业主体的能动性,提升城市活力;以有机社会团结城市各主体,增强城市韧性。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需要超越政治逻辑、市场逻辑和社会逻辑,树立“人民逻辑”新价值取向。以人民城市重要理念为代表的“人民逻辑”确立,不仅将城市治理的理论推向了新的高度,也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指明了方向。要坚持党的领导,发挥社会各主体的积极作用,尊重市民对城市发展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鼓励企业和市民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城市建设、管理。要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根本价值取向,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把群众大大小小的事情办好,坚持治理和服务的重心下移,把更多优质的资源、服务、管理放到社区,更好地为社区居民提供精准化、精细化的服务,切实把群众大大小小的事情办好,让群众享受更多发展改革成果。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新语

## 读懂『桑基鱼塘』的农业智慧

■ 叶斌

“桑基鱼塘”作为农业文化遗产,蕴含了丰富的农业智慧。汲取“桑基鱼塘”传统农业智慧,与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对于实现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发展,带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

从“桑基鱼塘”的形成发展来看,体现了“顺应天常”的生态发展观。桑基鱼塘起源于25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千百年来,长江流域劳动人民将地势低、常年积水的洼地挖深变成鱼塘,挖出的塘泥则堆放在水塘的四周作为塘基,逐步演变成“塘基上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的桑基鱼塘生态循环模式,从而达到了“两利俱全,十倍禾稼”的经济效益。

从“桑基鱼塘”的生物多样性来看,体现了“取之有度”的生态保护观。人们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把各种不同种类的鱼,如青鱼、草鱼、鲢鱼,与螺蛳、鳊、蚌等水生生物按一定比例混养,达到生物多样性共生共养的目的。随着水产养殖技术的提高,各地陆续出现了稻虾、稻蟹、稻鳊、稻鱼、稻鸭共生共养等多种模式,反映了人们在大自然开发利用的过程中,珍惜自然、节约资源,遵循“循时取物,取之有度”的准则和规范。

从“桑基鱼塘”的复合生态系统来看,体现了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系统观。把鱼、塘、水、田、桑、蚕、粪、丝、人等各要素按相生相克的原理统一于这个复合生态系统,实现了生态要素的系统治理,达到了物质和能量的叠加。

“桑基鱼塘”的农业生产模式,展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促进当前农业生产和生态治理,加快生产生活绿色转型具有示范意义。其所构建的乡村美景,包括人居屋舍、山水田园、桑林植被、荷塘酒舫等,从自然景观、建筑、色彩、构图等方面体现了写意画风格。汲取“桑基鱼塘”中蕴含的乡村景观美学价值和农耕人文精神,与现代农业科技及文创相结合,创新设计兼具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文化气息相融合、传统神韵与精神情感相契合的文创空间,营造“象外之象”“韵外之致”的乡村美景,不仅可以为当地农业发展带来极高的经济价值,更有助于为乡村振兴赋能,在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中发挥独特作用。

(作者单位:崇明区



乡村振兴  
篆刻:李立山